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

曾國藩、李鴻章及其時代

曾國藩、李鴻章及其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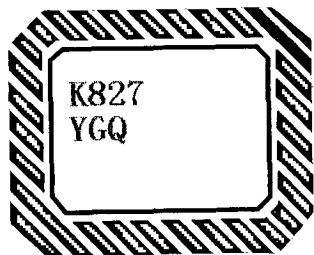
杨国强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杨国强 著

义理与事功 之间的彷徨

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字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彷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 / 杨国强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6
ISBN 978-7-108-02863-1

I. 义… II. 杨… III. ①曾国藩 (1811~1872) —人物研究②李鸿章 (1823~1901) —人物研究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8803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68 毫米 1 / 32 印张 6.75

字 数 152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目 录

- 曾国藩论（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1
- 曾国藩论（二）：从经世之学到西学东渐 23
- 李鸿章论：没有义理之学的洋务巨擘 54
- 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 76
- 读史断想：庚申与甲午之间的中国社会 167
- 后 记 209

曾国藩论（一）：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近代中国产生过不少矛盾人物。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打破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开了引接的门洞。容闳称曾国藩为“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①“特产”刻画了时代在一个士大夫身上留下的印记。“世事别来一番新”。这种富有历史内容的矛盾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儒学中国人的忧患困惑及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分化。

—

洪秀全发动了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这两个历史造就的对立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又代表着中国社会的这一段历史。

洪秀全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事业曾寄托着千万小农的利益和憧憬。小农既苦于传统，又囿于传统，在新的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十三章。

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他们原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传统。然而由太平天国聚合起来的小农却信仰着西方的上帝，一开始就否定了传统。这一矛盾，使发生于本土的社会群类的冲突在形式上首先表现为异端宗教同传统文化的冲突。由是，无法突破传统的事业，却取得了猛烈突破传统的外观：“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毁。”^① 在上帝教昭示平等的教义背后，是成群结队涌来的小生产者们燃烧着的激情。当金陵小天堂出现在人世的时候，洪秀全的理想似乎实现了。但是，没有内容的外观终究不过是一种幻境。激情冷却之后，天堂的影子也在风吹雨打中模糊了。太平天国借助宗教猛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跳出传统。使洪秀全获得力量的东西最后又使他丧失了力量。他在一大片土地上把旧日的社会秩序化为废墟。然而，为了反对不平等而建立起来的天朝新秩序仍然包含着不平等：“子不敬夫（原文如此）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臣不敬君失天伦，下不敬上失天伦。”^② 可以说，远在湘军的炮火把天京城墙轰塌之前，洪秀全的理想已经破灭了。

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而成为儒学士大夫的出类拔萃之辈。他并不讳言自己身上的血腥气味：“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③ 斯可谓化人间之至酷为寻常谈说，因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讨粤匪檄》。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496页。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638页。

此，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他为“刽子手”^①。但仅止乎此，用来说明这样一个人物又是远远不够的。曾国藩不是鲍超。他以书生而操杀人业，是人生信念驱使的结果。太平天国崛起于东南，多数人看到的是农民战争兵锋面前的王朝危机。曾国藩却看到了“外夷之绪”冲击下，“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前一种危机在中国历史的螺旋循环里并不算新鲜，后一种危机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比之李自成“不犯圣庙”；张献忠“亦祭文昌”，洪杨要可怕得多了。于是，产生了《讨粤匪檄》。它的主题，是一种强烈的保卫传统的自觉意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②在这个主题之下，曾国藩不仅代表王朝，而且代表圣道；不仅代表圣道，而且代表神道。由名教衍生的传统本是儒学义理的延续，但在这里却变成了引动杀机的使命感：“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③当曾国藩带着一身热孝奉诏而出的时候，举目四顾，看到的是“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在一片惨淡景象里，支撑着他的精神力量便是这种使命感。“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④他从这里径直走向战争，沾上满手鲜血，也因此而丧失了两个兄弟。“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⑤涕泪流入笔下，写出了由衷的哀痛。但其中并无后悔之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47年，第405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讨粤匪檄》。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737页。

④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与江岷樵左季高》。

⑤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915页。

意。这种不折不挠，使他体现了传统道德的理想境界；也使他身带着那个时代最亢厉的兵气。

因为曾国藩代表了传统，所以，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他远比洪秀全更能得到理解、承认和支持。在他的呼喊之下，汇聚起成批从性理之学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当权派，但比当权派更深刻地了解和熟悉社会；他们不是官僚，但比官僚更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处在王朝政权的底层，但因此而更直接地承受着农民战争的压力。旧制度培育了他们，他们又适逢其会地成了挽救旧制度的“抱道君子”。咸丰初年，东南地区的钦差、督抚在太平天国的席卷之势面前一溃再溃。但两湖战场却涌出了一群儒生变成的悍将。“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①他们杀人流血，也在于战场。在这些人身 上，孔孟程朱之教是以非常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最使人感慨而沉思的，莫过于“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②了。儒学哺育出来的儒学知识分子同上帝教旗帜下的农民为敌，但在他们指挥下出力死战的，又全是刚刚放下锄头的“朴实山农”。《湘军记》的作者王定安说过：“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③他的话表达了一个儒学士子对于那一段历史的解释。但他说出了传统制度下的农民同时又沉浸于传统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林君殉难碑记》。

② 转引自罗尔纲：《湘军兵志》，1页。

③ 《湘军记》，卷一，岳麓书社1983年版，2页。

影响之中的事实。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可能产生代表自己的独立意识形态。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便成为一种现成的权威。而生产方式的保守又决定了思想方式的保守。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古老的观念与同样古老的生活相适应，变为天经地义之物。曾国藩以“诸生讨训山农”^①，正是自觉地用自己的卫道意识来呼唤小农的卫道意识。如果说，聚集在洪秀全理想下的众多农民显示了小农精神世界的一半，那么，追随于曾国藩之后的同样众多的农民则显示了小农精神世界的另一半。于是，沿着传统，救平农民战争的事业正是从农民群众当中获得了主要的物质力量。这是一种造就了历史过程的历史矛盾。

洪秀全的失败和曾国藩的胜利，表现了传统的力量和传统的选择。一个濒临危亡的王朝因此而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命数。同治一朝的士人们半是称颂半是祝祷地名之为“中兴”。其实，在中国社会已经面临着近代化剧变的时候，这种力量和选择更像是中世纪的最后一阵回光返照。曾国藩在这个过程中以学问建立“事功”，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人物。“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②一代士大夫以比附历史表达了自己的推崇之忱。但是，具体的历史常常难以比附。同前代人物相比，时代为曾国藩安排的是另一种命运。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正同太平天国血战于长江中下游的曾国藩，面对面地遇到了挟着天津条约溯江而上的西方人。这

① 《湘军记》，卷一，《湘军记叙》，1页。

② 《清史稿》，39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11918页。

种相逢，使一个出自传统的卫道者目睹了传统之外另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界；一种旧式的暴力碰到了一种强劲的新暴力；外夷渗入了内战。在它的背后是庚申之变留下的浓重阴影。

当曾国藩接到中国同英、法、美三国新订的和约条款时，“阅之不觉呜咽”。^①比之洪秀全所谓“窃外夷之绪”，和约描绘的那种西方人带来的局面已经是马克思所刻画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了。它们褻渎和践踏了曾国藩的信念，因此，曾国藩一腔愤恨，以“五胡乱华”相比拟。^②呜咽和愤恨，在远望庙堂的忧时之泪里交融着中国人披发左衽的民族伤痛。它显示了曾国藩同他所鄙夷的“奉洋若神”者们的区别。当日起家买办的杨坊被打，曾国藩在信中说是“白齐文痛殴杨道（坊），足使挟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③这种称心快意之语，以双重的憎恶发舒了一个士大夫内心的本来感情。

但是，西方人用大炮两次打败中国的结果是泪水和愤火所无以为计的。在曾国藩的眼前，“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④它们带来了不可回避的逼迫之势。胡林翼视师安庆期间曾驰马江边，目见汽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他因之而“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⑤仓惶失措正是压力下产生的一种时代意识。这种意识不仅说明了胡林翼，也同样说明了曾国藩。曾国藩以水师肃清长江，用陆战攻陷坚城，同太平天国厮杀了十数年。其间，他既从太平军手里

① 《曾文正公手书记》，咸丰十年十一月卅日。

② 同上注。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复李少荃中丞》。

④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704页。

⑤ 薛福成：《庸愈笔记》，17页。

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为之“惊心动魄”，^①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船炮。过去凭道听途说而知道的“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②已经成为阅历之后的切肤感受。畏惧之心随之而生。曾国藩辛酸地承认过：“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③在他身上，惶遽怵惕之情超乎个人生死，而又带着啃心噬肺之痛：“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④这是一种真正的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畏惧是比较的结果。因此，它比憎恶包含着更多的理性成分。从这里走向反思不过是一步之远。剥绎畏惧之心，可以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士大夫中一部分身当其冲的人们在西方优势面前的危机感。这些人直面着现实，所以，他们又是当时中国最清醒的一部分人。危机呼唤自强。于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⑤

在近代中国，自强曾是一个多义词。但最被人注目的是与洋务运动同义的“自强新政”。曾国藩发其端绪，在抵御西方苦相煎逼的动机下接受了一部分西方的事物。这是儒学士人对于时势的一种逸出常轨的反应。二十余年前，林则徐、魏源已经见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先知者总是寂寞的。民族战争失败所换来的真知灼见，只能发为友朋之间的慷慨议论，成为没有回应的孤鸣，直到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一把大火使世人重新看到这个题目。咸丰十年岁末，曾国藩在一件奏折中用“此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864页；《曾文正公手书记》，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致左季高》。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655页。

④ 《曾文正公手书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⑤ 《清代七百人传》，上册，392页。

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的设问，引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①身同此境，心同此理，继林则徐、魏源之后，他是再鸣此声的第一人。次年，奕訢奏请购买外洋“小火轮船，益以精利枪炮”，用来剿洗太平天国。曾国藩力赞买船买炮之议，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但他意不仅仅在太平天国：“目下贼氛虽炽，而江面实鲜炮船，不能与我水师争衡。”同奕訢相比，他所着眼的是“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②斯时，湘军正倾全力猛攻安庆，没有一个人比曾国藩更直接地处于同太平天国为敌的地位。但是，他更担忧西方列强。他所使用的“救时”二字是概括时局之词，无疑已经包含着后来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来一大变局”的基本意思了。因此，当曾国藩赞成买船买炮的时候，他的目光并不止乎买船买炮：“欲访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③同一年，湘军攻陷安庆，第二年曾国藩即设内军械所，试制新式船炮。稍后，容闳奉派出洋采办机器，于是而有规模可观的上海机器局。曾国藩是一个起点，在他手里，“师夷智”从一种议论开始转化为一种社会现实。

但是，在内战和外患的并发之中，外患刺激下产生的接受西方事物的过程不会不同内战纠结相缠。复杂的历史环境曾使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

② 同上书，《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③ 《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137页。

曾国藩在外患和内忧的交错面前表现出一种心力俱绌的牴牾和彷徨。人们常常不忘记曾国藩是最早赞成“借师助剿”的人物之一。咸丰十年，他在奏折中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可以纾一时之忧”，^①就此留下了骂名。然而奏折之外，他还有一番全不相同的意思见于私人信札：“彼甘言蜜语，以师船助我打长毛，中国则峻拒之；彼若明目张胆，以师船助长毛打我中国，再哀求之，岂不更丑？”是以“宜虚与委蛇，与之为婴儿，与之为无町畦，犹为少足自立之道”。^②这些话表达了对西方人根深蒂固的疑虑。奏折是真实的，私信也是真实的。而两种真实之间却有着一道深深的裂痕。外在的牴牾反映了内在的彷徨，体现了一部分传统的士大夫在时代旋涡之中的一种心理过程。曾国藩经历了牴牾和彷徨，但牴牾和彷徨并没有淹没民族界限。两年以后，他作成《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留下过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贻讥于后世。”^③

曾国藩从船炮着手寻求自强。这种眼光既反映了他对西学的认识程度；又反映了他实利主义的选择标准。然而“师夷智”的过程一旦开始，近代工业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联系就会发生作用，拖着从事这一事业的中国人在接受西方事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其一，船炮引入了制器之器。安庆设局制造洋器，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612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复胡宫保》。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六，《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

“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这个结果使曾国藩看到了旧式技术同新式产品之间的矛盾。因之而有容闳出洋采办机器之举。古所未有的制器之器正是沿着这条渠道第一次为中国社会所自觉接纳的。不仅如此，同一个过程还复制出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的事实。据说，用这些机器做出来的落地开花炮之类，“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①制器之器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生产力。虽然它由船炮引入，并在生产船炮的过程中被复制出来，但它一经出现就会在量上积累，而且按照自身法则运动，或迟或早会突破开其始端者的狭隘预想。其二，制造引出了翻译。近代中国在缺乏相应科技背景的条件下移植了西方的机器工业，这是一种脱节。而语言障碍又加重了这种脱节：“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因此，曾国藩把翻译看做是“制造之根本”。他并不反对由外国人帮忙译出《汽机发轫》一类入门读物，但更寄意于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另勒成书。”^②从而产生了一种专门机构。曾国藩所注重的是“有裨制造”，然而近代工艺同声光化电是难分难割的。翻译不但输入了实用技术，也输入了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则会带来改变世界观的思想力量。在一个古老的社会里，这正是冲击古老本身的力量。其三，器引来了相应的“制”。当曾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新造轮船折》。

② 同上注。

国藩只注目于船炮的时候，自强之道不过意味着对泰西之器的一种拿来主义。但船炮其实不是孤立的东西。随着新作战工具的出现，“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①同治四年，曾国藩观看了“纯用洋人规矩”操演的淮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赞叹：“余平生所见部队不逮此远矣。”^②其所赞叹者已经不仅乎器了。三年后，他提出：江南水师往年所用之长龙、舢板均不便于出洋。“现于上海船厂制造轮船，又于芜湖等处试造广东艇船。俟船成之后，仍须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乃可角逐海上，日起有功。^③比之操演规矩，营制是更深的一个层次了。“仿西洋之法”是仿西洋之器的结果。在曾国藩的时代，这种由“器”到“制”的过程还刚刚初见于兵伍之事。但它已经使人意识到拿来主义不足以应付之。“酌改”和“略仿”的对举说明，接受外来之物和变更中国自身之物在这里是同一的。于是，从小小的一角开始，自强之道为了维护传统而戳破了传统。其四，“设局仿造”洋器引发了选送幼童“出洋学艺”。“夷智”最先表现为洋器。但仿造洋器的过程又会使人看到“夷智”之精妙并不系乎洋器。曾国藩在垂暮之年已经懂得：“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因此，重洋相阻的隔手仿造终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62页。

② 《曾文正公手书记》，同治四年八月廿八日。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六，《拟赴上海查阅铁厂片》。

不能收“远大之效”。这种见识来自洋务经验，又成为他采纳容闳教育计划的思想基础。同治十年，曾国藩领衔奏请选派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近代官费留学自此而始。曾国藩指望这些幼童子弟能从异国学来新的本领，同时又保留旧的思想：“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①但是，他们既离去故国而到异域，“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②成了与八股士子大不相同的另一种人。他们学到了新的本领，也学到了新的思想。

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被统称为“洋务派”的人们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又是中心固恋中国旧文化的人。李鸿章游孔林时说过：“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③这是一种新与旧的联想。相比之下，曾国藩初见西洋千里镜，惊羨之余，却发生了另一种联想：“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冶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④从千里镜想到进德之功，异乎寻常而又非常自然。透过这种联想，可以看到一个开风气之先者的保守心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日记中还留下了这样的话：“内人病日危笃，儿辈请洋人诊视，心甚非之而姑听之。”^⑤寥寥数语，画出了一个士大夫的传统感情。但是，在剧变的时代里，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

② 《西学东渐记》，第十九章。

③ 刘体智读《曾文正公手书记》眉批。

④ 《曾文正公手书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

⑤ 同上书，同治十年三月十九日。

命运会捉弄感情。当曾国藩手创制器、练兵事业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由此搬入中国的泰西之物竟是侵蚀二千年文物制度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制器之器为军火工业提供了新的生产力，而后，军火工业推出了民用工业，官办企业诱发了商办企业。传统社会的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在同一个时间里，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使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眼界大开之后，自然观急匆匆地转化为社会观。梁启超后来说：江南制造局译出的几十种“科学书籍”曾是光绪年间号称“新学家”的人们求知识于域外的“枕中鸿秘”。^①而留学生严复则以他的《天演论》促成了近代思想史上的进化论时代。洋务派哺育了自己的继承者和否定者。由是，在旧的社会形态被缓缓撕开裂痕的同时，传统的观念因冲击而动摇了。曾国藩曾经惊骇于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十哲两庑，狼藉满地”。^②然而“狼藉满地”并没有打倒传统。与洪秀全相比，曾国藩引来的西洋之物实在更利害得多。一个以捍卫传统起家的人却变成了否定传统的历史中介。它深刻地说明：在时势的逼迫之下，中国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不得已地接受了本来不可能接受的东西，承担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使命。由此，儒学士人的历史分化也就开始了。这是一种变态。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旧嬗递正是借助这种变态而越过了一个难以越过的环节。

三

两次民族战争的失败不仅触发了士大夫群体中一部分人的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60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讨粤匪檄》。